

# “十五五”首席观察：中国经济提“量”更提“质”

2025年，站在“十四五”收官与“十五五”规划谋篇的历史衔接点上，宏观经济环境交织着机遇与挑战。

这一年，中国金融市场在内外变局中走出独特节奏，核心领域表现亮点与韧性并存。货币政策延续“适度宽松”基调，保持“灵活高效”；金融促消费支持政策接连落地，“金融+场景+补贴”激活消费需求，实现供需适配与消费升级；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系统推进，一系列举措旨在打通经济循环、激发内需潜力、优化金融供给……

2025年的经济表现与政策选择，更为2026年启幕的“十五五”埋下关键伏笔：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矛盾是什么？顶层设计引领下，怎样真正实现消费的长期可持续增长？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又将如何探寻新突破？北京商报记者专访4位首席经济学家，进行全面解读。

这些贯穿短期调控与长期布局的核心命题，既是2025年衔接期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，也是理解“十五五”经济脉络的关键切口。

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：

## “稳增长”与“降碳”是一体两面

“降碳”的平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。“二者并非取舍关系，而是一体两面、内在统一。”王遥表示，经济增长需要绿色新动能，而降碳增效本身也创造新需求、新产业，共同指向更可持续的发展。

王遥称，绿色金融的关键作用，正是在于精准识别并牵引这种统一性，将资金引向高价值攀升与降碳协同的领域。这意味着，一方面，支持绿色产业提质扩面，推动新能源汽车、风光储能、循环经济等产业做大做强，使其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；另一方面，驱动传统行业绿色升级，通过

金融工具激励钢铁、化工、建材等行业进行低碳技术改造，用更先进的技术实现更高产值、更低能耗，在转型升级中焕发新的增长活力。“因此，绿色金融应通过标准引导、产品创新与风险定价，将资金配置到既能提升经济竞争力又能实现碳减排的关键领域，在动态平衡中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根基。”她表示。

同时，对于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，王遥建议，一是微观市场主体风险防范需强化精细化运营，金融机构自身也需提升风险管控能力。其中，包括对转型项目和绿色技术进行精细化管理和风险识别，开展气候相关风

险压力测试以评估潜在损失，主动优化资产结构以避免过度集中于某一绿色赛道或技术路线，并积极运用绿色保险、损失分担等金融工具来对冲和转移特定风险。二是在宏观监管层面，可不断健全审慎管理框架。监管机构通过持续完善顶层设计，逐步将气候变化风险、自然相关风险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。通过明确转型金融标准、强化环境信息披露、设定绿色资产风险权重、开展全行业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等手段，识别并防范跨市场、跨行业的风险传染，确保绿色转型进程整体平稳有序。



站在“十四五”收官与“十五五”谋划的历史交汇点，我国绿色金融已实现从规模扩张到体系完善的关键跨越。截至今年三季度末，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达43.51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2.9%，近五年增速持续保持20%以上高位。

作为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首个五年，“十五五”时期绿色金融如何从“深水区”破局，在2026年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？在引导金融资源从高碳领域向绿色低碳领域转移时，又应如何避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？需要建立怎样的宏观审慎管理机制？王遥认为，在“十五五”时期，实现“稳增长”与

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：

## 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不能“各写各的”

“五篇大文章”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指明重点领域。2025年，“五篇大文章”部署紧锣密鼓。

2026年“五篇大文章”有望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？“十五五”时期，应如何理顺数字金融与其他四篇文章的协同机制，避免发展失衡？杨涛表示，首先应把握好“五篇大文章”的层次关系与协调配合模式。一方面，数字金融是做好“五篇大文章”的主线，重在通过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优化，努力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，并为其其他

四篇大文章“提质增效”。科技金融则是重要抓手与核心目标，绿色金融则旨在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，普惠金融与养老金融则是进一步落实金融发展的政治性与人民性；另一方面，做好“五篇大文章”不能“各写各的”，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应该着眼于其交叉与融合地带。如数字金融与其他四篇大文章可全面结合，科技金融、绿色金融、普惠金融都可以着眼于支持中小微企业，绿色金融理念也可融入到其他大文章中。

同时，杨涛认为，还应重点夯实写好“五篇大文章”的环境要素。例如，金融征信服务、数据信息服务、风险管理服务等，都是共性且必需的基础要素。以科技金融为例，其突出难点就是缺乏系统性、可信度高的科技企业信用评估模式和评级标准，使得“高人力成本、高研发投入、轻资产”的科技企业难以符合金融服务准入标准，相应的增信手段仍然不足，由此需要在此领域加快推动生态与环境优化。

此外，杨涛指出，要在开放条件下理解“五篇大文章”的发展路径。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已经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环节，也就是以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为核心内容的开放，这也给“五篇大文章”带来了全新的外部要求和约束变量。例如，在数字金融领域我国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，尤其是移动支付产业呈现一定领先性，但就全球视角看，我国数字金融创新的核心竞争力还有不足之处，“走出去”进行全球布局的程度仍然较低。



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、兴业研究学术评审委员会主席鲁政委：

##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望“加量降价”

引外资投向先进制造、现代服务、研发设计等领域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；二是扩大进口高品质消费品和中间品，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；三是在推动规则、管理、标准与国际接轨的基础上，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，可规范国内企业竞争行为，通过“开放压力”深化国内市场化改革；四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。

同时，鲁政委认为，步入“十五五”后，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与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均有发力空间。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方面，2026年人民银行将延续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，预计人民银行将继续降准降息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，同时兼顾金融体系的健康与可持续。在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方面，随着传统

货币政策工具对于信用扩张的拉动减弱，货币政策将更加依靠资产负债表工具和宏观审慎工具，如在货币吞吐调节方面，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，我国在操作工具、操作模式和操作规模仍有较大创新提升空间。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方面，可对当前效果较好的工具进行“加量降价”，即适时增加额度、降低利率；可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探索，如对于支持资本市场的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（即证券、基金、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），探索其常态化的制度安排。

此外，2025年人民币汇率在复杂外部环境下面临挑战，市场也普遍预期人民币汇

率2026年将呈现温和升值态势。对此，鲁政委表示，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动力是内外部波段共振的结果。在国际，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和美元走弱，受此影响中国境内美元市场流动性宽松，中美关系在2025年上半年出现摩擦，下半年进入缓和期；在国内，尽管国内处于货币宽松周期、房地产市场仍有待企稳，但信贷需求在2025年反弹、库存同比也从低位修复。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提升，跨境资金流动愈发频繁，本币汇率更易受到外部冲击，容易出现过度波动和偏离国内基本面。

鲁政委预计，2026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“前强后弱、全年大致区间震荡”。



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：

## 通过落实带薪错峰休假等释放消费潜能

今年，一系列消费补贴政策陆续出台，各项促消费政策也呈现出从“增量拉动”到“结构优化”的转变。

对于这种政策逻辑转换的必要性与有效性，郭磊表示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“国内供需矛盾突出”，正是在这一判断基础上，政策进一步指出“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”，消费作为需求端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在政策框架中的位置自然是十分重要的。2026年，作为“十五五”首年，提升消费率毫无疑问是主线之一。

“政策侧重点可能会有所变化。”郭磊认为，这两年我国“以旧换新”政策集中于耐用消费品，这一部分需求释放后，继续激励可能空间不大，2026年优化“两新”政策实施的提法，意味着明年不再在两新“加力扩围”的总量加码；“释放服务消费潜力”的提法下，预计服务消费可能成为新一轮政策重点。

“消费本质上取决于居民的全生命周期收入预期，所以促消费需要从收入机制入手。”郭磊表示，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“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”来看，

“以收入促消费”是政策在“十五五”期间的关键思路。

结合当前消费市场环境看，郭磊认为，目前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矛盾是，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仍随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阶段，而利润表受名义增长、就业环境影响。对此，他建议，除增收外，2026年可采取多维度政策组合：一是落实“因城施策控增量、去库存、优供给”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和居民资产负债表，还可以进一步灵活扩大公积金用于消费的品类和范围；二是“落实带薪错峰休假”，这

一政策可以促进形成分散化的类黄金周，优化消费体验，降低酒店机票等成本，激发服务消费需求；三是清理现存消费限制，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稿就明确指出“清理汽车、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”；四是改善一般物价环境。价格水平低会导致实际利率偏高，且会助推消费的等待效应，推动价格水平进入温和正增长区间有利于激励消费意愿；五是推动平台企业与劳动者共赢发展，提升灵活就业人群收入与保障水平。

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媛 刘四红 廖蒙 宋亦桐

